

吴开泰 / 著

印
钞

YinChaoRen

YINCHAOREN

10 ZHONGGUO RENMIN YI



印
钞

人

YIN
CHA
ORE
N

中国工人出版社

Y
I
N
C
H
A
O
R
E
N

Yin Chao Ren

印钞人



吴开泰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钞人/吴开泰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1

ISBN 7-5008-2454-8

I. 印…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00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011)
电 话：(010) 62005033 62005042
印 刷：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5.125
印 数：1 ~ 3364 册
定 价：22.80 元

序

也许是因为我曾在印钞这个特殊行业里工作过的缘故，在思绪中时常萦绕着一个问题：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又是世界上最早印刷、使用纸币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反映这方面生活的大部头文学作品呢？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的印钞工业，与国家同兴衰共命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它的每个脚印，都蕴藏着生动感人的故事，其中每个杰出的代表人物，都闪耀着民族智慧的光芒，更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文学创作素材可谓俯拾皆是。可惜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过于强调它的保密性，致使世人无缘领略它的风采，文学艺术家也望而兴叹，从而在文坛上留下了一块空白。

“心有灵犀一点通”。当老友吴开泰把他创作的《印钞人》打印稿放在我的案头时，我惊喜地翻阅了起来，在赞佩之余，不由得拿起笔来为之作序。

吴开泰是一位老资格的工人业余作家，他老当益壮，笔耕不辍，时有佳作出手。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拾叶集》是在1997年他68岁时出版的。随后，又立即向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进发。他扎根在印钞行业这块肥沃的生活土壤中

已有半个多世纪，饱吸了工厂母亲乳汁的丰富营养，且善于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体验感悟，潜心研究，形诸于墨。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默默耕耘，《印钞人》这部散发着“印钞人”的泪水和汗水气息的小说，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应运而生。这是用岁月酿成的一坛陈酒，它填补了空白，消除了遗憾，实在是一件好事！

百年沧桑，人物众多，事件纷繁，从何入手？作者从剖析旧中国“印权外溢”这一怪现象入手，高扬革命救国、科技兴国的主旋律，化繁为简，一气呵成，演绎出了一个令人感慨、催人奋进的完整故事。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与中国印钞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本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诸如最早做印钞“强国梦”的老技师陈永新、青年工人发明家徐英发、从奴隶到主人的郭金柱、钢版雕刻国手吕金泉，以及工厂的领导群体等等，既有生活原型的艺术再现，又有典型的集中，所涉及的重要事件，在史上也大多有迹可循，只是经作者的剪裁，更富于戏剧性而已。小说在细节上的描绘也比较生动，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风貌。正是这些人、这些事，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东西方列强严密封锁下，新中国人民币的防伪技术，竟然在60~80年代的20余年中，独树一帜，令世界印钞专家们瞠目。这是一本值得一阅的好书。

《印钞人》的整体艺术水平，既有稍逊于名人名作的缺陷，又有专业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优点，尤其当我想到它是出于一位年逾古稀的业余作家之手，而且是迄今文坛上第一部以印钞行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什么挑剔的话能轻易出口呢！

祝小说《印钞人》出版成功，并愿引用我咏残荷的一

首小诗与老友开泰共勉：

绿叶枯黄顺水游，
残荷带露迎金秋。
凋颜莫叹桑榆晚，
灿灿夕阳亦风流。



2000年4月19日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3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7
第七章	91
第八章	104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37
第十一章	152
第十二章	169
第十三章	186
第十四章	203
第十五章	220
第十六章	237
第十七章	247

第十八章	263
第十九章	283
第二十章	301
第二十一章	319
第二十二章	332
第二十三章	348
第二十四章	361
第二十五章	376
第二十六章	387
第二十七章	398
第二十八章	411
第二十九章	426
第三十章	443
第三十一章	456
尾 声	469

第一章

铅灰色的云把天上的日头遮得严严的，阵阵西北微风，刚好摇得动落光了叶子的秃顶树梢，吹得路人的耳朵、鼻子、脸蛋子发红。而此时印钞厂的凹印工房里，却像一个闷罐子蒸笼，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工人们赤裸着身子，只用一块旧擦版布围扎在腰间，有少数穿衣服的人，也不过是被油污腻得光溜溜的汗褂和短裤头而已。即使如此，工人们的身上仍到处沁着汗珠，待他们用沾了油墨的手把汗一抹，那被抹的部位便显现出红的、绿的……不同的颜色。好在多年如此，习以为常，他们谁也感觉不到有何可笑可怪之处。

上午十一点半钟刚过，工人们便把印过的活儿向库房交割完毕，争先恐后地跳进工房内专设的混浊不堪的浴池里。这不是厂方的仁慈和工人的享受，而是生产过后的一种必需。他们马马虎虎地把身上的油污洗掉，急急忙忙地到更衣室穿上自己破旧的棉衣，纷纷走出工房，在工厂大门铁栅栏的内侧蜂拥着，等待着，脸上显露出焦躁不安的神色。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冬天，在中国所展现的一幕。

它发生的地点，在古都北平外城南面偏西的右安门和西面偏南的广安门之间的交叉点上，一个叫白纸坊的地方。

白纸坊，曾是旧日京都外城八坊之一。提起它，人们会很

自然地同那里还残存的十来户手工抄纸的作坊联系起来。而一些具有考证癖好的人，也许会从元朝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去查找它的起源。那本书在“礼部之下”的条目中，记载了会同馆、教坊司、铸印局、白纸坊、油磨坊等五个衙署及生产机构的名称。人们还可以据此去追溯它曾为官家手工造纸的辉煌历史，查证它的地理位置变迁的沧桑。然而，现今维持着白纸坊和它周遭地区稀疏的村落式街巷市面繁荣的支柱，却是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第一座国家印钞厂。

印钞厂横亘在短短的白纸坊的南端。它已经在那里端坐了38个年头。晚清时，它的名字叫“度支部印刷局”，民国以来，改称“财政部印刷局”……如今则是“中央印制厂北平厂”。故事就发生在它那架着铁蒺藜电网的高墙内外。

人们为什么这样匆忙、这样焦躁呢？也许这可以算得上被沦陷区的老百姓称之为“惨胜”的景象之一吧！人们苦煎苦熬地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收大员们坐着美国飞机从天上飞来了，工厂当作“敌产”被接收了，3000多名工人的生计也被断绝了。日伪的“联银票”是不能再印了，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法币”却依然是美国钞票公司、英国钞票公司的囊中之物，而且至今还没有让这个印钞厂沾过边儿。眼下，他们印的只是几个地方银行的铜元券、银元券以及税务局的税票等零活儿。作为一个大型国家印钞厂，这只能维持着锅炉不熄火，管道不被冻裂罢了。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似乎很对工厂新贵们的心思，他们以房子、娘子、车子、金子、票子什么都要的“五子登科”闹剧，依然是好戏连台。只是，不愿把丝毫利益让工人们得了去，于是便宣布了半日生产，并发半薪的政策。全薪尚且难得温饱，

半薪岂不更要饿饭？所以，工人们要在停工的那半天的时间里，到社会上去，使出浑身解数，给自己和妻儿老小去“找饭辙”。

“呜——”，汽笛终于响了，铁栅栏门缓缓打开，少数人被唤到稽查队去搜身，多数人像潮水般涌出。厂门两旁的饭铺、酒馆和路边的各种吃食摊——卖馄饨的，卖豆腐脑儿的，卖小枣切糕的，卖烧饼油条脆麻花的，卖瓜子、花生米、冰糖葫芦的……顿时都忙碌了起来，迎接这每日两次生意高潮的最后一次。凹印电机班2号机的郭金柱冲在人潮的潮头上。他浓眉大眼，五大黑粗，穿一件拆洗得发白的黑色中式棉袄，戴一顶棕色旧毡帽，年纪在40岁上下，微微内瘪的圆脸盘上带几分憔悴，两只眼睛却挺有神儿。他快步走到一个吃食摊前，坐上了一条矮长板凳，说了声：

“刘掌柜，先来俩窝头，一碗豆汁，咸菜丝多来点。”照北平的传统习惯，卖豆汁的咸菜丝是不收钱的，人们喝豆汁不光是为了解渴，还是为了白吃咸菜丝就干粮。

“郭爷您坐好，来啦！”摊主忙不迭地答应着，把两个黄澄澄、尖溜溜、用玉米面蒸成、被印钞厂工人戏称为“黄金塔”的大窝头码放在一个粗瓷大盘子里，顺手盛了一碗热腾腾、酸唧唧的豆汁，用筷子夹了一小碟切得极细的咸菜丝，先后摆放在郭金柱的面前，又忙着张罗别的顾客去了。

郭金柱不等豆汁咸菜端来，先拿起一个窝头，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待到这第一个窝头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这才略微放慢了吃的进度，就着豆汁咸菜开吃第二个。

“咳！这年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啦！”刘摊主叹息着在叨唠：“物价一天一个样儿不算，就说那日伪的联银票换法币吧，鬼子投降了好几个月才往回收。本来市面上的比价，也就

是五十比一左右，可政府却规定按二百比一去换，期限短，兑换点又少，可坑杀人喽，有多少买卖家关门歇业呀！亏了我的本钱少，紧倒腾，上午卖的钱下午就去粮店进货，就这样还赔了一百多个窝头钱哪！”

“喝！刘掌柜也谈论起国家大事来啦，”郭金柱哈哈大笑：“你的生意不好做，我的工难道就好做了么？不过，说话还得留点神，别让侦缉队的黑狗子们听见，拿你当共产党抓了去。”他又要了一个窝头，自己动手从咸菜盆里夹了一大筷子，塞进了窝头眼儿，揣进怀里，吩咐：“记账，开支一块儿给，老规矩，照还账那天的价钱算。”

他起身向北走去，进白纸坊胡同，经崇效寺西墙外，过枣林街，在一大片低洼地前停住了脚步。他此行的目标，是广安门脸儿上的隆昌车厂。他可以从这里向西折北，顺着洼地西沿的上坡，经大华窑厂门口，出南线阁到达广安门大街，路虽有点绕远儿，但平坦好走。他也可以从脚下的一条人行小路斜穿过洼地中心地带的乱坟场，出宝应寺东侧的干面胡同到达广安门大街，路虽抄近儿，但有两点传闻使他略生迟疑。一是关于治安方面的。由于荒僻，时有打闷棍、套白狼的抢劫行为在这一片地方发生，夜间还有“贼仗鬼势”、装神弄鬼以吓唬行人洗劫财物者。这一点他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且身强力壮。二是关于宝应寺里那群恶狗，是专咬穷人的。说来话长，这宝应寺建于何时？寺中供奉何等神佛？近处居民均知之甚少，也极少有人去探查考证，在他们的记忆中，在很早以前，这里便是山东登州、莱州、胶州一带居住京都人士寄存灵柩的处所，寺中僧人也不晓得何年何月被三州同乡会看管灵柩之人所取代，并养了一群狗，终日紧闭着寺门。所以，人们干脆就叫它“登莱胶”，原先的寺名反而被淡忘了。

对于那群狗，人们更是“谈狗色变”。据说，那群狗白天是关着的，到了夜间便放出来去吃寺前坡下乱坟场里新下葬的死人，眼睛都是红的，特别凶狠。于是，“登莱胶”又有了“恶狗村”的别名。其实，那群狗白天是用铁链子锁着的，夜间虽放开，但却紧闭寺门，狗只能在寺庙的高墙之内自由活动，以防备盗灵者的光顾。碰巧的是，寺外也有一群无主野狗游荡于乱坟场之内，吃死人或夜间袭击行人之事确实发生过，人们传来传去，便把罪名加在了“登莱胶”那群狗身上去了。郭金柱站在那里思忖了片刻，断定白天既不会遇到恶狗的袭击，也不至于有拦路打劫的歹人，于是就大踏步顺着小路径直地走了下去。

乱坟场的小路很静，郭金柱的思绪却乱了起来。他原籍河北省武清县。还在度支部印刷局时期，就在那里招过工，是第一批拖着大辫子的农民转化为近代印钞工人的地方。所有在局子里做工的人，回家谁也不肯细说印钞厂的子丑寅卯，这就使它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不但是神秘的，而且具有一圈神圣的光环——那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是财神爷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做工的人都是为财神爷“轧票子”的，这是天机，而天机是不准泄露的。他就是怀着这样的神秘感，在 15 岁那年被父亲领着进了京城，由一位亲戚的引荐，把一个内藏 10 块袁大头的点心匣子送到了总务课长石克然的宅上。三天以后他就进了局子，成了一名凹印工人。头三年，他被称为学徒，月薪是四块半大洋。三年后，他成为工徒，月薪也变成了大洋六元。照那个时候的物价，六块大洋可以买三袋白面，一袋 44 斤，三袋合 132 斤。五年后，父亲替他娶了远房亲戚赵家表妹为妻，他的日子就艰难起来了。后来，不发银元发票子，日本鬼子在的那会儿，吃混合面，闹霍痢拉，他五尺半的身块差点撂在脚下

这块乱坟场里。现在，现在怎么啦？他的月薪变成了法币2400元，半薪打五折，拿到手也不过能买50来斤棒子面，刚够还刘掌柜摊上的窝头账，妻子和孩子们吃什么？想起老婆孩子，郭金柱这条硬汉子竟然也觉得鼻子发酸。他的赵家表妹，嫁给他20年，跟着他受了20年的罪，给他生过六个孩子，可只有两个活了下来，就两个还养活不起哩！12岁的大儿子德福，上过几年工友子弟小学，“惨胜”后上不起啦，成天在大街上的桥头、漫坡处帮人拉小祥儿，从拉排子车的苦力口袋里抠几个小钱。8岁的二儿子德顺，跟一帮穷孩子东奔西跑，挎个破筐头，捡煤核，拾烂纸。老婆从来都不闲着，现在是整天帮人“缝穷”来挣点油盐钱。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商定每天半天班上完，先赊账吃一顿窝头，然后直接奔车厂租车拉车，挣钱多少，当天买成棒子面带回来，当作全家次日的口粮。就这样，四口人紧忙活，也只能算是凑合着活着。也有人劝他：“人挪活，树挪死”，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想办法挪挪窝儿，另找个挣钱多的事儿干。另找别的事儿？那么好找！连大学生、大学教授还吃美国的救济粉哪！再说，他在局子里干了25年，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儿，那里的机器响声，那里的油墨气味儿，都让他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感受是什么？他说不出来，只是觉得有点依恋，不死心，模模糊糊地觉得还有盼头。盼什么？盼着工厂有朝一日会兴旺起来，不但他自己要好好卖一膀子力气，他的小福子、小顺子长大了也要进局子，有力气也要卖在那里边。

郭金柱边走边想，心醉神驰，种种复杂的感情搅和在一起，理不出一点点头绪来。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也许够不上“士”的格，却是个戏迷，往日局子里工友们的戏社活动，他饿着肚子也得参加，此时，他把平日在印钞工人中流传

的一首民谣套上老生名角谭富英的唱腔，来了一段西皮原板：

下班抄起洋车把，
长街卖力做牛马。
劳工神圣成空话，
饥寒交迫苦挣扎。
迎面北风嗖嗖的刮，
冻得我上牙打下牙。
冷也得拉，饿也得拉，
不拉就没有黄金塔。

他尽量把声调唱得豪气一些，慷慨高昂的唱腔在空旷的乱坟场荡漾，惊起了一群乌鸦，“哇、哇、哇”地乱飞乱叫。

郭金柱今天拉车的开头运气不错。他从隆昌车厂租到车，向东刚走到王子坟路口，便揽到一个中远程的座儿。他抄起车把，经下斜街，出上斜街，进宣武门，一溜颠儿跑，从西单北大街进大木仓，斜着朝西北方向钻了几个小胡同，到了锦什坊街的辘辘把胡同，坐车的那位太太在车钱上没有亏待他。随后，他又从白塔寺稍东一点的地方拉一位学者模样的人到沙滩红楼，也没怎么跟他砍价。

冬天日短，天渐渐黑了下来，他的肚子也咕咕地叫个不停。有了两趟车钱垫底，他心里踏实了，便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把怀里揣的那个窝头拿出来，三口两口吞下去，到临街的一户人家讨了一碗水喝，然后坐在车座上数了数两趟生意挣下的钱，起身走进一家粮店，买了五斤玉米面，装入一个小布口袋，揭开车座，放入下边的工具格里。他心里盘算着，至少还要再拉一趟，因为前两趟的钱全都搁在那五斤玉米面里了，没

有留出当天的车份儿钱来。不过，要向西向南，朝离家近的方向走，向北向东再远的地方就不去了。于是，他用胳膊驾着车把，顺着北池子大街向南小遛达，用要高价的无礼方式，气跑了一位要去东直门外的顾客。

这时，一位身穿军便服、头顶船形帽的国军大兵出现，从其脚下的一双美式黑皮靴上，可以断定是一位下级军官。大兵招手把郭金柱叫到跟前，既不问价也不还价，一屁股坐到车上，说了声：“前门石头胡同”，就再不开腔了。郭金柱暗暗叫苦，但又不能不拉。被称为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是北平妓院集中之地，大兵在这个时光去那儿，一准是寻欢作乐去的。郭金柱觉得，这趟车的方向是合适的，按他往常的经验，车钱怕是有点麻烦，但他也绝不会轻易吃这种人的亏。

他气喘嘘嘘地把车拉进大栅栏，经观音寺到了石头胡同北口，大兵叫停，下车抬腿就走。郭金柱向前追了两步说：“老总，车钱。”大兵猛停步回头，用浓重的南方口音“威猛”地喝道：“老子抗战八年……”郭金柱则用少有的和颜悦色说：“老总您抗战八年，自然是劳苦功高，咱拉车卖力，也不能白跑是不？您就把车钱赏下来吧！”大兵恼怒地飞起一脚，用那双美式黑色大皮靴向他踢来，口中犹自不干不净地说：“龟儿子，给你车钱！”他闪身躲开；大兵又抡起右手向他嘴巴扇来，他伸手叼住大兵的手腕子；大兵的左手又扇过来，他也用左手接住，形成四手交叉的麻花状，并继续不急不火地说：“老总，您抗战八年，劳苦功高，‘五子登科’大发财，一星半点的车钱算不了什么，还是快赏下来吧，里边还等您去享艳福哪！”大兵想把手抽回来，但郭金柱的大手像两把大虎钳，哪里抽得动！大兵气极败坏，大声喊道：“反了，反了！警察快来，抓这个臭拉车的！”警察没叫来，却招来一大帮围观看热闹的。

人们见此奇景，均快意兴奋，有喝彩的，有劝说的，七嘴八舌，都是编排大兵的不是，同情“臭拉车的”郭金柱。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拎一根文明手杖的清瘦老人，分开人群，进入圈内，看了一眼郭金柱，又看了一眼大兵，不怒自威地喝问：

“你是哪一部分的？你的长官叫什么名字？跟穷拉车的胡打撕闹，成何体统！”

大兵懵了，他当然不敢回答老人的喝问，手又被钳得生疼，只好用几近哀求的调子低声向郭金柱说：“你放开手，我给你钱。”

郭金柱看了看老人，又看了看里外三层的围观者，料定大兵不敢耍赖，遂松开了手。大兵把手抽回去，甩了甩手腕，依然感到发麻，极不情愿地掏出一张法币摔在地上，转身挤出人群，悻悻地仓皇而去。围观者一阵开心的大笑，也都一哄而散。

老人又看了郭金柱一眼，一声没言语，转身向西而行，郭金柱也架起车把跟了下去。约摸走了二三百步，老人停住脚步转过身来，郭金柱则紧走几步凑了上去，俩人并肩而行。

“陈爷，真有您的，那个大兵还真叫您唬住啦！”郭金柱喜笑颜开地说。

“这种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他到这种地方来，从理儿上说是犯军纪的，别看他横蛮横蛮的，其实心里头是发虚的。我一唬他，问他是哪一部分的，长官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我吃几碗干饭，就懵了，怕了，手又被你叼住，跑不了，只好乖乖地把车钱交出来。别说这些孬种，就连当年张大帅的奉军进关，‘后脑勺子是护照，妈拉巴子是免票’，照样让我给唬住。”老人显然有些得意，他回头向后面看了一眼说：“就怕碰上宪